

Myth, Mould, Fire

Research Papers On Ceramics

神话·泥范·窑火

* 陶瓷研究论文集 *

沈芯屿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Myth, Mould, Fire
Research Papers On Ceramics

神话·泥范·窑火

* 陶瓷研究论文集 *

沈芯屿 著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责任编辑：黎 阳

整体设计：赵 淼

责任校对：钱锦生

责任出版：葛炜光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神话·泥范·窑火：陶瓷研究论文集/沈芯屿著.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9. 8

ISBN 978-7-81083-868-9

I. 神… II. 沈… III. 古代陶瓷—研究—中国—文集
IV. K876. 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17359号

神话·泥范·窑火——陶瓷研究论文集

沈芯屿 著

出 品 人：傅新生

出版发行：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中国·杭州市南山路218号／邮政编码：310002

<http://www.caapress.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制 版：杭州东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杭州浙大同心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版 次：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张：7

开 本：889mm×1194mm 1/32

字 数：150千

图 数：57幅

印 数：0001—1000

ISBN 978-7-81083-868-9

定 价：32.00元

目 录

序

- 4...30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概述
 - 18...越瓷的起源与越文化
 - 28...建盏与宋代福建茶文化
 - 34...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考证
 - 41...管窥杭州出土的元青花瓷器
 - 44...趣味与风韵——论魏晋越瓷的装饰艺术及其审美情趣
 - 60...试论明代民窑青花瓷画中的民俗风情与国画意韵
 - 68...温润古雅 礼乐之韵——简述宋官窑青瓷装饰、造型的审美意象
 - 76...对明正统青花八仙祝寿纹罐上星座的探讨
 - 82...“图式的象征”：越窑和耀州窑瓷器的地域性比较
 - 94...南青与北青：论越窑耀州窑青瓷文化的比较
 - 108...魂兮归来 谷物盈仓——论吴晋越窑谷仓的文化功能及其消失
 - 130...越窑研究概述及其方法论的探讨
 - 140...两晋越窑青瓷双鱼洗与中国鱼文化
 - 146...越瓷真伪辨析之管见（节选）
 - 186...翠色 琢玉 梅青（节选）——越窑龙泉窑与耀州窑青瓷文化对比研究
 - 202...苍狼白鹿——杭州出土元青花相关问题的探讨

后记

序

沈芯屿的这本陶瓷研究论文集，是她从事文物古陶瓷研究工作二十五年来积累的。自1989年以来，她先后在《东南文化》、《东方博物》、《中国古陶瓷研究》、《南方文物》、《福建文博》等刊物上发表的古陶瓷文章数十篇，涉及的窑窑有越窑、南宋官窑、建窑和景德镇窑等，范围很广。应该说，这是她二十多年来从事文物古陶瓷研究成果的一个很好的总结，我由衷地为她感到欣慰。

在浙江从事陶瓷研究，当然首先认识的是青瓷。她在1989年发表的《30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概述》一文，对20世纪30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概述的基础上，认为青瓷研究应该介入文化人类学、美学、民俗学等新的方法论，为将浙江青瓷研究推向更高层次提出了新的观点，是一篇有一定学术性的文章。2000年发表的《趣味与风韵——论魏晋越瓷装饰艺术及其审美情趣》一文，主要采用美学研究的方法，对吴晋越窑青瓷装饰艺术的文化源流、士族趣味和士族风韵三个方面，阐释了魏晋时期越窑装饰艺术的特有风采。该文研究方法和角度新，把瓷器装饰风格与当时的文化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在研究上是有一定突破的。2008年在《东南文化》上《魂兮归来 谷物盈仓——论吴晋越窑谷仓的文化功能及其消失》一文，是一篇谷仓研究的力作。作者

关注该器形、研究达二十年之久，收集了大量的关于谷仓研究的资料，阅读了相关的文献，从文字考据、民俗、神话、宗教起源和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对谷仓的起源、演变、装饰以及消失，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分析和考证，为以往的研究增加了新的注释，是一篇有学术价值的好文章。《古雅隽永 礼乐之韵——简述宋官窑青瓷装饰、造型的审美意象》一文，把对宋代官窑的釉色和礼器造型的出现，与宋代王朝的审美情趣结合起来分析、论述。沈芯屿认为宋代官窑有装饰和礼器造型的特点，是宋代帝王、文人的审美意境的再现，充分展示了她的瓷器文化研究特点。另外，在越窑和耀州窑的南北青瓷文化的对比研究方面，沈芯屿同样运用民俗、文化人类学和美学的理论方法，做了探索性研究。对此，我已经在《翠色 琢玉 梅青——越窑、耀州窑、龙泉窑青瓷文化对比研究》一书中做过评价，在此就不另复述了。

在元青花研究方面，沈芯屿也取得了较大的收获。1978年在杭州文三路发现一座元墓，墓内出土瓷器八件，墓志一件。墓志中写明该墓葬于元至元丙子年，立碑的是墓主的曾孙明安答儿。元代先后有两个至元丙子年，我国古陶瓷的大专家冯先铭先生，在《有关青花瓷器起源的几个问题》一文（刊登在《文物》1980年第4期）中，将该墓的年代定为“前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墓内出土的三件观音像，断定是元初景德镇生产的青花瓷。沈芯屿在《关于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两点考证》一文中，通过对立碑人明安答儿和墓内出土的“枢府”款云雁纹碗的考证，断定该墓的年代是元代后至元二年（公元1336年）。以后，在2007年，她又以《杭州出土元青花观音像年代的两点补证》一文，通过墓碑“己酉”日期和历史背景的考证和推理，进一步证实了该墓葬年代为后至元的观点，为该墓的正确断代做出了贡献。可喜的是，在今年北京首都博物馆举办的“青花的记忆”元青花特展上，就采纳了她的观点，肯定了她的考证断代的正确性。她的《苍狼白鹿——杭州出土元青花相关问题的探讨》一文，对大部分国内出土的元青花进行了排列，认为杭州出土的元青花观音像与延祐、至正青花是承上启下的关系；杭州出土元青花的产地为景德镇；并对观音像的名称提出了疑义。同时

提出元青花是元代有身份地位人的一个标志的论点。浙江，因为历史上多青瓷窑，所以素来以研究青瓷为重，出土元青花很少，因此在元青花研究方面比较弱。作为杭州出土的元青花，能有今天这样的成果，与沈芯屿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其他，沈芯屿在《建窑与宋代福建茶文化》一文中，介绍了建窑的制瓷历史，在北宋时生产了高质量的兔毫、油滴和鹧鸪斑纹的黑釉茶盏及其生产工艺，提出了建窑黑釉茶盏的产生与建州产名茶、流行“斗茶”的习俗有关。文中引用文献资料阐明茶文化的发展、演变与“斗茶”的形成和情趣有关，对建窑黑釉茶盏做了全面深刻的研究，学术价值高。《明代民窑青花瓷画中的民俗风情与国画意韵》一文，把明代民窑青花瓷画的民俗渊源、国画意韵与明代的文艺思潮结合起来研究，揭示了明代晚期出现的青花瓷画，与当时的文人心理有着密切的关联。这在明代青花瓷研究方面是很有学术性的。

以前在研究古代陶瓷器时，主要谈瓷器的历史、产品种类、器形、纹饰、胎釉特征、制瓷工艺和烧瓷的窑炉结构等，其他方面讲得很少。其实陶瓷是人们主要的生活用具及陈设品，所以瓷器的品种、器形、纹饰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沈芯屿在这本论文集中叙述器形、纹饰时都分别说明受到当时政治、文化或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使中国古陶瓷的研究更加深入全面。在文章中，还较多引用文献资料，但并不局限于文物资料，而是其他的，有文化人类学、美学等。这说明她的阅读面广，研究思路或角度新颖。

通过这本论文集，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沈芯屿在古陶瓷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已经形成了她特有的风格。我希望她能继续努力，期待她出更多的成果，为浙江古陶瓷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朱伯谦 2009年6月16日

30 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概述



五代·越窑青瓷龙纹罍

浙江是青瓷的发源地，30 年代以来，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随着西方新型学科的介入，中国陶瓷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在以后的数十年中，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在浙江青瓷的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今天更多的学者仍然只注重于实证的研究方法，客观而精确地报告所发现和考证出来的第一手资料。他们勤恳踏实的工作，为浙江青瓷研究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令我们钦佩。应该说，他们的工作，已经为今天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青瓷是浙江地域文化的一个标志。它从起源——发展——鼎盛——衰落，都与这个地域的人群生存的生活形态息息相关。因此，它不应该仅仅是地层、断代、器形绘图的报告。它应该是一种文化形态中的产物，它的

每个时代的造型与纹饰，以及制作的技艺都凝聚了古人的情绪、思想和当时的文化特征。为繁荣浙江青瓷研究，提高陶瓷研究的水平，我们有必要将这些成果进行系统的回顾和概述。这会有助于我们开阔研究思路，看到我们研究中的不足。笔者认为：让文化人类学、美学、民俗学、原型学等更多新方法介入陶瓷研究，把陶瓷的造型、纹饰、制作工艺等，放在人的生活形态中去研究，这才是我们今天需要思考的问题。本文着重将 30 年代以来，浙江青瓷研究情况作一简述。

—

如果从商代的原始瓷开始，浙江的青瓷制作应该有三千年的漫长历史了。然而，对于瓷器的研究，真正地上升到学术的起步是从上个世纪 30 年代开始的。正如汪庆正先生所述：“……古代文献中有关陶瓷史的专门著作极为罕见。”^{〔1〕}因此，更谈不上分门别类的专题性研究了。由此可见，如果与陶瓷起源相比，陶瓷研究的起步是很晚的。同样，青瓷研究也不例外，在《格古要论》、《陶说》、《景德镇陶录》、《陶雅》等专门的陶瓷古文献中，多见条目性地叙述窑址的产品或简单介绍一些古器，多以古玩鉴赏的角度为主。即：“散见于各种史书、地方志、历代诗文等等的宝贵资料均缺乏系统全面的理论性的分析与汇集。”^{〔2〕}在中国历史上，陶瓷的制作从来都是凭经验操作，或是家族传承，根本没有专门的用料配置记录和化学成分分析表。因此，很多的工作需要后代的人来完善。在此之前，对陶瓷的研究不可能有一个相对系统的方法。

“五四”以后，进入 30 年代，陶瓷研究同样受到新科学和新思想的影响。1937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第一本《中国陶瓷史》^{〔3〕}，作者吴仁敬、辛安潮，以历史沿革为线，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的章节中对青瓷做了相对系统的概述，属文献资料汇集整理类型的研究方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大凡都会觉得它的过时。这主要是：第一，作者缺乏自身实地调查、勘察的实质性依据。第二，随着考古事业的发展，不断有新资料出土，考古队伍专业化的提高等，与 30 年代已经是不可同日而语了。然而，从研究的角度看，它的贡献在于试图打破以往的古玩

鉴赏的叙述方式，把当时已经出土和传世文物排列后，“统一”到一个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去论述，这是以往所有专门的陶瓷文献中所不见的。在有的章节中，作者对瓷器的叙述，与地域文化的特点结合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恰恰是我们今天所不为重视的。因此，我们不得不认为，这是一部有一定理论高度的陶瓷史。

在浙江青瓷研究史上，早期最有贡献和影响的学者应该是陈万里先生。有人说他是一个“永远生活在趣味中的人”，有人说他是“我国近代第一位走出书斋，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的学者”。^[4]他曾经无数次地前往上林湖越窑址、龙泉古窑址等，进行实地考察、地域文化的调查。他把陶瓷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趣味。在他的文中，我们看到的是娓娓道来的充满情趣的叙述。他把古文献资料与实地考察相结合，记载了他的见闻与考证。1941年他撰写出版的《瓷器与浙江》^[5]便是这方面工作的一个结晶，作者以流畅而质朴的笔调，记述了浙江青瓷在中国制瓷史上的地位。同时，对秘色瓷与越瓷、龙泉窑与哥窑的关系、吴晋时期的浙江青瓷等进行了论述，书中还有陈先生数次前往越窑、龙泉窑址的调查和一些对青瓷印记的考证等记录。他的这种对古窑址进行实地考察和调查的研究方式，其意义是极为深远的。它是浙江窑址考古的“前身”，也是中国窑址考古的开始。这不仅对今天的青瓷研究产生了影响，也为后来考古工作者对浙江青瓷窑系进行系统的研究及科学考古发掘打下了基础。他是开浙江窑址考古先河的人物，同时也代表了浙江青瓷研究的第一个时期。

值得一提的还有，30年代，有日本人在杭州的凤凰山一带寻找南宋官窑的遗迹和瓷片。被当时国民政府发现以后，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创建了“硅酸盐”研究所。这是陶瓷界第一批优秀的陶瓷科研工作者，也是中国陶瓷研究新科学的开始。以周仁先生为主的研究者，对南宋官窑遗址进行了初步的发掘，对出土的标本进行了化学测定。在1931年，《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一文刊登在当时的《国立中央研究院总报告》上。^[6]此文采用古文献考据与化学分析相结合的手法，对杭州南宋官窑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测定，突破了传统的陶瓷外观研究方法。成为“运用

自然科学手段进行定性、定量分析和年代测定”研究方法的创始人之一。

二

第二个时期是进入 50 年代以后，陈万里先生又相继发表了《再谈越器》^[7]和《中国青瓷史略》^[8]等论著。他根据自己多年来对浙江青瓷的调查，又进行了更全面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对已发现的青瓷器物进行排比论证，写出了《中国青瓷史略》。书中以充分有力的证据阐明了浙江青瓷在中国制瓷史上的重要地位。从青釉器在浙江开始烧造，唐代越器的盛行以及其他地区的青釉器，五代钱氏的越窑，南方的龙泉窑，北方青釉器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官窑器是什么等九个方面阐述了中国青瓷的发展历史。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已经简述了中国青瓷的外销，为瓷器外销研究打开了视野。

1964 年，周仁、张福康先生联合发表了《关于传世“宋哥窑”烧造地点的初步研究》一文，围绕“宋哥窑”的烧造地点和真面目的问题，展开了几个窑口器物的对比和化学分析的研究，根据相应的数据，他们认为：“传世‘宋哥窑’不在龙泉烧造之说是可以接受的，龙泉黑胎青瓷可能就是正統的哥窑这种说法也是有相当根据的……传世‘宋哥窑’很可能是宋以后景德镇所烧造的。”^[9]

1956 年，邓白先生《东瓯缥瓷纪实》^[10]一文，作者通过对“缥瓷”和瓯窑的线索，前往温州永嘉西山一带，对那里的瓷窑进行了实地调查，客观真实地报告了当地瓷窑的分布，并对采集的标本的胎体、釉色、纹饰等进行排列、分类和描述。作为瓯窑的研究，这是第一篇具有考古学方法的、较为完整的报告。

郭仁先生的短文《关于青瓷与白瓷的起源》^[11]发表于 1959 年，他对当时已发表的有关瓷器起源的各种观点及出土器物同文化源流进行了分析与概括，提出了青瓷是由原始瓷和印纹硬陶演变过来的，“青瓷和白瓷本来是不可分割的，没有青瓷就没有白瓷”的论点。

50年代末至60年代早中期,浙江考古界的一部分青年学者投入了实地考古发掘工作,又对浙江青瓷的部分窑系做了大量的实证性工作。这里主要有王士伦先生的《余姚窑探讨》^[12]一文,作者把古文献、方志材料和实地考察的窑址、器物结合起来,互相参证,论述余姚窑、越窑及秘色瓷的关系。继后,朱伯谦与王士伦两先生联合发表《浙江龙泉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13]一文,作者以考古调查的方法,将古文献的记载、历史背景与实地调查的情况结合起来。对龙泉的金村、八都、竹口的窑场和瓦窑垟以及大窑一带等五十余处的瓷窑,对不同时期的窑场场房、窑炉结构、窑具、装烧工艺和器物、器形等,都做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澄清了以往人们对白胎青瓷统称为弟窑的说法,以及所谓“紫口铁足”的黑胎青瓷属哥窑产品。而浅白釉色,开大小纹片的厚胎瓷器,在这次调查中没有找到类似遗存。以客观科学的态度,报告了调查的情况。这一时期,汪济英先生发表《记五代吴越国的另一官窑》^[14]一文,文章采用考古学和民俗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记述了对上虞县窑寺前窑址的调查情况。作者运用古文献的记载考证认为,窑寺前窑址应该是五代吴越国王钱弘俶时期的一处官窑场。文章说理周密严谨,为研究五代越窑官窑提供了可贵的资料。

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浙江青瓷窑址考古趋于广而深,金华地区的婺州窑址受到了关注。金祖明先生的《龙泉溪口青瓷窑址调查记略》^[15]中,作者对龙泉溪口一带的五代至元代的青瓷窑址进行了试掘,并对出土的标本进行排列、描述和分析。为编撰《龙泉青瓷史》夯实了基础。1965年,张翔先生对金华地区的窑岗山、外山,大垅、瓦叶山、窑瓶湾、东屏村、厚大庄等青瓷窑址进行了调查,发表了《浙江金华青瓷窑址调查》^[16]的报告,为婺州窑的研究埋下了基石。

70年代晚期到80年代,是浙江青瓷研究的第三个时期,也是浙江青瓷研究的一个发展时期。李知宴先生在1973年发表的《关于原始青瓷的初步探索》^[17]一文,从瓷器形成的条件、陶与瓷的区别,经过化学测试,明确商周青釉器就是原始瓷,还对原始青瓷出现的背景等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1978年,叶宏明和曹鹤鸣先生联合发表了《关于我国

瓷器起源的看法》^[18]一文，从陶瓷工艺的角度，利用科学分析的研究方法，在浙江地区青瓷窑址调查发掘的基础上对瓷器的起源、陶与瓷的区别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观点，显示了浙江硅酸盐研究的实力。1979年李知宴先生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制瓷业的成熟》^[19]一文，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瓷器的造型特点、装饰、器形演变和工艺进行分析。根据历史发展的线索，用科学分析与考古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南北朝青瓷窑系的出现、器形特点、装饰及制瓷工艺，对南北青瓷做了较为系统的对比研究。



五代·越窑青瓷鸞注子

三

在8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国陶瓷研究进入了研究史上的黄金期。1981年，李辉柄先生《略谈我国青瓷的出现及其发展》^[20]一文，以丰富的考古资料阐述了青瓷的发展过程及创造成就，其中不乏独到见解。此时，浙江考古界涌现出一批在几十年的工作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中青年学者，为浙江的考古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1981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紧水滩工程考古队浙江组发表的《山头窑与大白岸——龙

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从地理环境和发掘情况、遗迹与产品、窑体结构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该地窑址的年代、装饰花纹的变化、胎釉变化等，将龙泉东区的山头窑址和大白岸窑址情况做了全面的展示，为龙泉窑发展史的研究增加了内容。^[21]其中在青瓷研究方面成就较为突出的有朱伯谦先生。1983年由中国硅酸盐研究学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22]，朱伯谦先生以战国、秦汉原始瓷，魏晋南北朝瓷器，唐朝、五代越窑、瓯窑、婺州窑等几个章节阐述了浙江青瓷的发展历程。著名专家冯先铭先生写宋代青瓷，龙泉窑及元明青瓷由上海著名学者汪庆正先生编写，作者以社会发展为背景，将几十年来许多学者对浙江有关窑系的科学发掘、分析、考证的所获做了系统的论述，勾勒出了中国青瓷发展的历史及五大窑系的脉络，不仅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同时也将青瓷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峰。虽然，有的资料尚有待补充，有的观点尚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它在浙江瓷器研究史上的地位仍是不可低估的。在论述中，有更多的篇幅涉及了瓷器与文化源流、经济贸易及人类生存的关系，预示着青瓷研究的范围和方法将出现新的突破。与其同年出版的《中国的瓷器》^[23]一书，注重于从工业生产、制作工艺的发展研究角度，对浙江青瓷窑系做了科学的论述，为认识青瓷工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其他还有，1981年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浙江工作队发表的《浙江龙泉县安福龙泉窑址发掘简报》^[24]，反映了当时由该所工作队、上海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对安福地区龙泉窑址的一次大规模发掘的情况。主要有金坝坨宋代窑场、金岙湾元代窑场、石大门山宋元窑场的工场、辘轳、窑炉结构等，做了详细的报告，展示了龙泉窑民窑的制瓷工艺水平。1983年，贡昌先生发表的《浙江省武义县管湖三国婺州窑》^[25]一文，通过对管湖三国窑窑的调查，发现婺州窑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有窑址开始烧造，推翻了古文献记载婺州窑始烧于唐代的说法。

1985年，朱伯谦先生发表的《浙江瓷业的新发现与探索》^[26]一文，是作者在陶瓷史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及周边地区新窑窑的发现，做了新的思考与探讨。对德清县境内新发现的东周原始瓷，两晋时期的青瓷

窑址；在各地发现的汉窑及其影响的章节中，对瓷器的起源问题做了分析和阐述，提出了浙江青瓷由原始瓷发展而来的观点。还对婺州窑的乳浊釉和浙江青瓷的外销问题做了相应的探讨，使得1983年出版的《中国陶瓷史》中德清窑、婺州窑等章节又得到了新的补充，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1988年，由李刚、王惠娟编撰，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越瓷论集》^[27]一书，是一本上虞地区的窑址调查以及越窑研究的论文集。1988年，由贡昌先生撰写，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婺州古瓷》^[28]一书，把作者数十年来对金华婺州地区的窑址调查、考古发掘的研究报告集中出版，为婺州窑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



唐·越窑青瓷蟠龙器通

四

20 世纪 90 年代至 21 世纪,可以说是浙江青瓷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各种类型浙江青瓷学术研讨会相继召开,学术成果更是硕果累累。随着瓷窑考古的发展和不断深入,大量墓葬的出土,人们对越窑的认识已经有了一个基本清晰的脉络。人们的学术思路活跃,探讨大胆,有的文章对以往的研究提出了反思。1991 年,《江西文物》出版了《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收集了包括早期越窑、汝窑、龙泉窑和景德镇仿龙泉窑等南北青瓷的研究论文三十余篇,为浙江青瓷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93 年出版的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上,任世龙先生对浙江瓷窑址考古十年做了论述。作者认为,编撰《中国陶瓷史》,对浙江青瓷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瓷器窑址考古,“从此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一个新兴的分支”^[29]。作者对龙泉窑考古的收获和意义、浙南瓷业区系考察的重要启示、南宋官窑发掘及其相关问题和越窑考古的现状和展望等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提出“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也不完全等同于中国陶瓷发展史的研究。它要求我们在追溯古代瓷器发展历史过程中,具体地揭示自身的运动规律与发展的逻辑轨迹”。^[30]这个观点的出现,应该是陶瓷研究的一个进步,已经接近阐释文化人类学的观点:让一个地域的器物的线条和色彩自己“说话”,而不是古人去替它“说话”。这样的观点,使以往的考古发掘报告的研究有了一些延伸。1997 年,任世龙先生的《浙江古代瓷业的考古学观察——遗存形态·制品类型·文化结构》一文,就是作者前一篇论文研究思维的延续。从考古发掘报告中吸取第一手资料,然后对一个时期的青瓷的造型、纹饰等进行归纳、分析和论述。文中阐释了虽然两个窑拥有较大的共同分布区域,而且明确地存在时间先后和发展上的血缘关系,但应属于两个瓷业先行后续的序列形态。对传统的越窑名称,提出了“先越窑”和“越窑”的名谓。^[31]

1997 年,沈岳明先生的《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谈起》一文,从对低岭头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一批“类官窑”器形,进行了考证和推论,认为低岭头窑与南宋“修内司”官窑有内在的联系。^[32]

1998年,浙江省博物馆在杭州召开了龙泉窑青瓷国际学术研讨会。朱伯谦先生出版了《龙泉窑青瓷》图录,从器形、胎釉、纹饰等方面,对龙泉窑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并对哥窑、弟窑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3]在对秘色瓷研究方面,郑建华先生1999年发表的《越窑贡瓷与相关问题》^[34]一文,运用古文献和出土文物资料相结合的考证研究方法,认为秘色瓷即是官方督烧的贡瓷。1999年,李刚先生编著的《青瓷风韵》^[35],以散文的笔调,展现了作者对青瓷的独特见解。

2000年,汤苏婴先生编著的《浙江纪年瓷》一书,对浙江出土的有纪年的青瓷资料和器物进行编录和论述。^[36]2002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召开2002年越窑国际学术讨论会,同时出版了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的《寺龙口越窑址》^[37]报告和慈溪市博物馆编著的《上林湖越窑》^[38]。其间还出版了论文专辑^[39],收集海内外论文三十一篇,沈岳明先生做了关于越窑研究的概论,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越窑的研究进行了分期,对数十年的研究成果进行了评述,指出了越窑研究中有争议的论点。对越窑的定名、秘色瓷和越窑的衰落问题,做了阐释。其他还有很多学者对越窑的源流、性质、纹饰等诸多问题做了论述。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将越窑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2006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分别在南京、杭州召开。会议对浙江的早期青瓷、南京出土的青瓷和其他地区的青瓷窑址进行了学术探讨,收集论文达六十余篇,与会人员从青瓷起源、纹饰、造型、南北对比等各个角度,对青瓷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为浙江青瓷研究的更加深入,起到了推动作用。

2008年,“瓷之源”原始瓷与德清县窑学术研讨会在德清市召开。与会人员对德清市境内的亭址桥、火烧山原始瓷窑址进行了实地考察,进一步明确了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出土的原始瓷为德清原始瓷窑烧制。会议期间,有关专家对原始瓷的起源、名称以及瓷器起源的问题做了探讨。这次会议的召开,为瓷器起源的研究,翻开了新的一页。其他的研究作品还有很多,如越窑与高丽青瓷的研究,越窑与其他青瓷窑址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